

# 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分布<sup>\*</sup>

邓亦兵

**内容提要:**清代前期,京城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因此由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地论推导出来的京城市场空间结构并不符合实际。由于商品粮食是京城市场交易量最大的商品,其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详细描述清代前期京城商品粮食的市场分布,并期待在研究其他商品市场后,总汇京城市场布局,以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清代前期 京城 粮食市场分布

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一文较早利用地理学中的中地论对元、明、清北京城市市场空间结构的特点、演变过程、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绘制出各时期的市场图,并指出“中地论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均质性地域上的理论学说,而实际市场区除受中地论地域结构的控制,同时还受着多种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的作用”。<sup>①</sup>但其并未对实际的北京城市市场进行具体研究,而是基本由理论推衍而来,以期对中地论进行“验证”。这无疑值得进一步探讨。

清初,政府不允许商人进内城交易,<sup>②</sup>而是给内城的政府官员、八旗军队及其家属配给住房和以稻米为主的漕粮。与此同时,政府保留了在外城的全部商品市场,形成内外城不同的制度。因此,在内城,不仅没有市场,连商铺都很少见,嘉道之后各类商铺才有设立,政府是通过设立制度来配置资源;在外城,则拥有比较完整的市场,由市场配置资源。总体而言,当时北京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城市中心地理论建立于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由其推导出来的北京市场空间结构,自然与事实不符。本文根据清代前期北京的具体史料,对当时的粮食市场分布进行具体描述,并绘制市场分布示意图,为将来全面研究清代前期北京城市市场布局奠定基础,以期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 一、康雍时期的市场

按理说,住在内城的官兵食漕粮,并未参与市场交易,其粮价应该与外城市场粮价没有直接关系,但实事并非如此。康熙时,内城八旗官兵分到漕粮后,只能依靠自己将原粮(带壳稻谷)捣去米壳,再食用。“八旗官兵自定鼎以来,居住内城,所关粮米原系自行舂碾,未有雇见旁人者。”后来,“有山东、山西两省来历不明之人,入京开设碓、碾”。八旗官兵则将漕粮交给碓房<sup>③</sup>、碾房<sup>④</sup>等商铺,不再

[作者简介] 邓亦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100102,邮箱:bengyb@126.com。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批准号:16ZDA129)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中地论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宏观区位理论。按照中地论,市场为提供最优服务,应位于圆形市场区的中心地方,但对于整个地域来说,相邻圆形市场区之间会出现空档,为弥合空档,市场区以正六边形最为经济合理。参见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第6期。

② [清]王先谦:《清东华录全编》第2册,顺治元年九月甲午,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③ 碓房是一种专门用捣米器具将带壳稻米之米壳捣去然后出售的商人店铺。

④ 碾房与碓房一类,是专门加工粮食的,如将麦子或一些杂粮碾磨成面粉。参见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自行春碾。<sup>①</sup>以后,有商人设立米局,<sup>②</sup>平常存贮米谷,并不开门,在官方开仓放米时才开张,伴随仓米支放而营业,专门零星收购八旗官兵的俸、甲米,待仓粮支放完毕,再向外销售。每当开仓放粮时,市场粮价都会受到影响。对此,康熙帝疑惑不解,令皇子们到各处调查情况。康熙四十三年(1704),胤祉等皇子向康熙帝上奏京城粮价时,称“遣人往正阳门外大米铺及皇城内外米铺、市肆小米面铺等地访问,各地大同小异。正阳门外米铺价:老米每[仓]石一两二钱、稷米每仓石一两一钱、小米每仓石一两二钱、高粱每仓石八钱、黑豆每仓石一两二钱、干麦面每斤二十钱、切面每斤十七钱。皇城内外米铺价:老米每仓石一两二钱八分、稷米每仓石一两一钱五分、小米每仓石一两三钱、高粱每仓石八钱、黑豆每仓石一两二钱、干麦面亦每斤二十钱、切面亦每斤十七钱。市肆及小米面摊价:老米每仓斗一钱三分、稷米每仓斗一钱二分、小米每仓斗一钱四分、高粱每仓斗九分、黑豆每仓斗一钱二分、干麦面每斤二十二钱、切面每斤十八钱。”<sup>③</sup>据此,可以得知当时京城的具体粮价情形,参见表1。

表1 康熙时京城各地粮食价格表

名称	地点	正阳门外大米铺	皇城内外米铺	市肆及小米面摊
老米		1.2 两/仓石	1.28 两/仓石	1.3 两/仓石
稷米		1.1 两/仓石	1.15 两/仓石	1.2 两/仓石
小米		1.2 两/仓石	1.3 两/仓石	1.4 两/仓石
高粱		0.8 两/仓石	0.8 两/仓石	0.9 两/仓石
干面		20 文/斤	20 文/斤	22 文/斤
切面		17 文/斤	17 文/斤	18 文/斤
黑豆		1.2 两/仓石	1.2 两/仓石	1.2 两/仓石

说明:表中价格单位为“两/仓石”者,以银计;价格单位为“文/斤”者,以钱计。

经比较可见:(1)老米的价格情形为:正阳门外最低,皇城内外比正阳门外高0.08两,市肆及小米面摊比正阳门外贵0.1两,比皇城内外贵0.02两。(2)稷米的价格情形为:正阳门外最低,皇城内外与市肆及小米面摊各差价0.05两。(3)小米的价格情形为:正阳门外最低,皇城内外与市肆及小米面摊各差价0.1两。由此可知,老米、稷米、小米的价格都是在正阳门外为最低,说明正阳门外是粮食聚集地,有批发功能。皇城内老米、小米、黑豆、切面的价格比内城其他粮价高,说明皇城内旗人从商铺购买粮食,而皇城内米铺则需要从东四、西四两牌楼米铺批发粮食,因而形成东四、西四牌楼粮食批发市场,正如康熙四十九年胤祉等再次奏报:“臣等遣人往京城内米铺访问粮价,东、西四牌楼、南城粮价大约相同,皇城内粮价稍贵”。<sup>④</sup>

康熙时期,有专门为旗人春碾米谷的铺户,与“八旗官兵,以所支之米,不运至家”“即行变卖”有关。<sup>⑤</sup>雍正时,亦有“铺户贾人”购买八旗兵甲米。<sup>⑥</sup>漕粮自大通桥,沿东护城河,直接浮运入东直门、朝阳门各仓漕粮。朝阳门内北侧有富新仓、兴平仓;朝阳门外有太平仓、万安仓;东直门内有海运仓、北

① 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革职留任尚崇坦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219页。

② 史料中有私立米局、私局、米局等称谓,同时也有官立米局的记载。私立米局何时开始设立,笔者目前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但史载康熙时期,就有商人收购八旗俸、甲米,只是未见私立米局的名称,乾隆时期才出现了“米局”的称谓。私立米局比官立米局出现得更早,且在嘉庆、道光年间明显增多,其功能是零星收购,成批卖出。参见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掌京畿道监察御史屏治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0755-035;《清高宗实录》卷827,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1页。

③ 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四日胤祉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④ 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胤祉等奏报京城粮价并阴雨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686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24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97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7,雍正元年五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43页。

新仓;东便门外有裕丰仓;护城河北岸有储济仓、裕丰仓。在这些米仓周围分布着大量碓房、碾房等零售商铺。“旗人所关之粮,交与舂碾,久久习熟,竟有关米出仓,并不载运回家,而直送至碾、碓,听其销算者。”<sup>①</sup>在外城,宣武门外有粮商开设的米铺。<sup>②</sup>是时,常有装运米粮的车辆经过正阳门外大道。“有车户装运米石,过猪市口,人稠势挤,车猝覆,压伤一人,臂骨中断焉。”<sup>③</sup>居住在外城的百姓多食用麦子、高粱、干面、切面,所以这类市肆小面粮铺是零售网点,其小米铺、摊贩直接从正阳门外购进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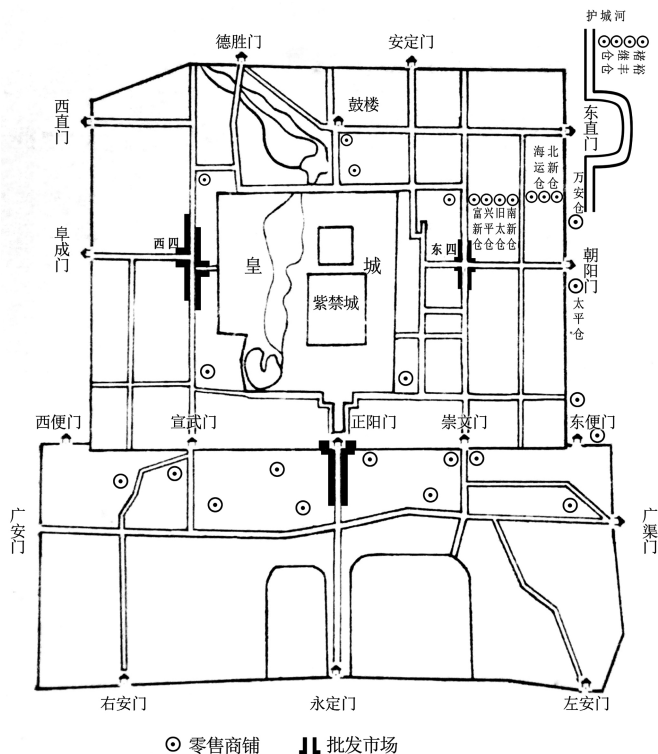


图1 康雍时期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图<sup>④</sup>

图1为康雍时期北京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图,从中可见,康熙、雍正年间,批发市场在内城的东四、西四牌楼以及外城的正阳门外粮食街。是时,以碓房、碾房、米铺为代表的粮食零售网点分布在粮仓附近,后渐布内城其他地区,这种零散的分布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在外城,由于民人都从市场上购买粮食,所以零售网点比较均匀。

## 二、乾隆时期的市场

乾隆时期,内城延续了康熙、雍正时期东四、西四牌楼原有的粮食批发市场,“米谷积千仓,市在瞻云坊外”。<sup>⑤</sup>瞻云坊,即西单牌楼。据载,嘉庆时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有一个大院,其房主称:“我们开设米店房屋,从前原系山东人殷大父子在彼开店买米。殷大于前年回山东原籍,我将房屋租住。”房主“自开天合号米铺”,陆续租给安大等人,亦开店售米,共有8家商铺。<sup>⑥</sup>如果上追两辈,至

① 镶红旗汉军副都统革职留任尚崇坦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218—219页。

②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四日步军统领隆科多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42页。

③ [清]陆毅:《巡城琐记》,光绪年间重刊本,第15页。

④ 本文绘制的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各图,得到许檀教授、赵伟洪博士的指点以及吕洁女士的帮助,并参考了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6期)一文中的北京城图,在此一并致谢!

⑤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皇都品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重排本,第42页。

⑥ 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长麟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2-028。

少是乾隆时期,山东殷氏父子就在东便门外椿树园地方开设粮店,收买俸、甲米,实际上就是米局,具有批发兼零售的功能。从通州运输漕粮的路线在东直门、朝阳门外,其附近分布了一些粮仓。其中,裕丰仓(护城河北岸)、储济仓(裕丰仓北侧)周围有许多商铺,形成了分布于一条街上的零售兼批发市场。在宣武门外,“市近米盐喧耳畔,客疏尘土积堂坳”。<sup>①</sup>可以看出,正阳门外、东直门外、宣武门外已经成为批发市场。

有关零售市场的记载见于乾隆二年(1737),“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sup>②</sup>且“碓房所售乃多细米”。<sup>③</sup>从中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出现的碓房数量比康熙时要多,且内城、外城都有。“五城内外,大小行铺,同风相应,兼之通衢僻巷,多设碓房,既收舂斛之利,更为敛囤之区。”<sup>④</sup>笔者估计,大概每三四条胡同就有1家碓房、碾房或米铺。八年,山西汾州府汾阳县民周二称,在朝阳门外,“新桥地方开杂粮米铺生理”。<sup>⑤</sup>三十八年,正阳门外有天丰粮店。<sup>⑥</sup>五十二年,官员在京城内外“查封米、麦共计六万余石,铺户共有数百余家”。<sup>⑦</sup>不过,其他各类商铺在内城比较少见。<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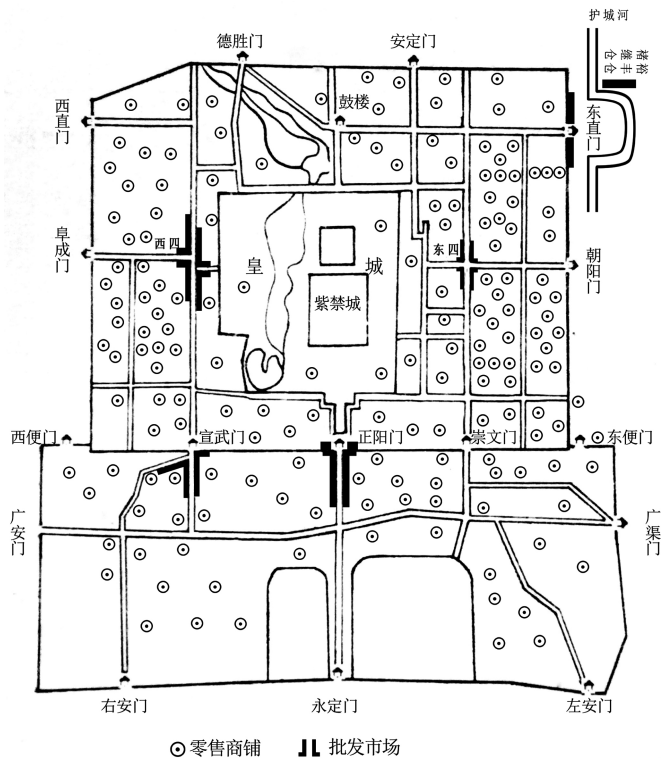


图2 乾隆时期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图

① [清]钱大昕:《自珠巢街移居宣武门外题壁》,《潜研堂诗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36《市粟五》,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5187—5188。

③ 李洵等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77《土田志十六》,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8页。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37《市粟六》,考5197—5198。

⑤ 乾隆八年六月十八日舒赫德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档案》第A123—6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印行,第B69257—69258页。

⑥ 《正阳门外粮食市火神庙碑记》(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刻)记载,当时“都城人稠户密”,其“北至天丰粮店”。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清)》第73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⑦ 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定亲王绵恩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0765—018。

⑧ “兹查得城内开设猪、酒等项店座七十二处。又指称售卖杂货,夜间容留闲杂人等居住店座四十四处。又专租人居住店座十五处。伏查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除将猪、酒等项店座,应准其开设外,其指称卖物容人居住店座四十四处,专租人居住店座十五处,均飭令移于城外。”[清]多罗定郡王等:《金吾事例·章程三》“京城内禁止开设店座”,咸丰年间刻本,第41页。

图2为乾隆时期北京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图,从中可见乾隆时期批发市场增加了东直门外、朝阳门外到东便门外的护城河附近(裕丰仓、储济仓、裕丰仓北侧等地)以及宣武门外等区域。与此同时,与康熙时期相较,乾隆时期京城粮食零售市场的分布面积不仅有所扩大,商铺数量也有较大增加,散布于内外城。

### 三、嘉道时期的市场

嘉庆时期,批发市场的分布比乾隆时期又有所扩大。是时,有内务府官员广兴购买了正在经营的米局,其中有西堂子胡同永吉米局房屋2间、西堂子胡同公顺米局房屋3间、西堂子胡同同聚米局房屋2间、西堂子胡同义口米局房屋3间、西堂子胡同全顺米局房屋2间、西堂子胡同恒隆兴隆米局房屋14间、金鱼胡同恒源米局房屋4间、金鱼胡同西德盛米局房6间、金鱼胡同逢源米局房6间。<sup>①</sup>可见,东四牌楼附近的西堂子胡同和金鱼胡同一带形成了米局集中地,成为米粮零售兼批发交易市场,这也可能是米市大街地名的来历。道光时人也有相同记载:“米市(一概老米),在东、四牌楼南。”<sup>②</sup>康熙、雍正以来,内城粮食批发市场,除原有的东四、西四牌楼之外,到嘉道时,增加了西堂子和金鱼胡同附近地区。在外城,原来的正阳门外、宣武门外批发市场仍然存在。有韩国使臣看见“正阳门外,于路上见骆驼数百匹,载米而去,驱者不过数人。时方河冰未解,不能行舟,故陆运入于米铺云”。<sup>③</sup>同时,“崇文门外米市,即为奸商业集之区”,<sup>④</sup>所以崇文门外也形成了批发市场。

据各档案记载估算,是时零售市场中的商铺至少有数百家,<sup>⑤</sup>这些商铺分布在内外城。西安门外、阜成门内三道栅栏、石老娘胡同、广安伯街、华嘉胡同等地分布多处商铺。正阳门外新丰口胡同有德成号碓房,杨梅竹斜街朱家胡同有复成号碓房和天福号碓房。<sup>⑥</sup>西直门内,自新街口起至西直门止,共有米铺32座;西直门外,共有米铺20座。<sup>⑦</sup>西直门内有合盛公店等15铺。<sup>⑧</sup>道光时,西城有复兴面铺。<sup>⑨</sup>隆福寺附近的大沟巷和隆福寺都有碓房。<sup>⑩</sup>据宗人府调查,“白庙〔北路西〕纪姓增盛〔店〕碓房。”<sup>⑪</sup>北新桥有米铺天源号。<sup>⑫</sup>东便门内有“广顺和店等七铺”。<sup>⑬</sup>广宁门内有“米铺八家”。<sup>⑭</sup>广渠门内有“天泰店等十铺”。<sup>⑮</sup>朝阳门外也有碓房,<sup>⑯</sup>有裕泰粮店。<sup>⑰</sup>东便门外有许多米局,如前述椿树

① 嘉庆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内务府大臣英和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790-003。

② [清]杨静亭编:《都门纪略》,张智主编:《中国风土志丛刊》第14册,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影印本,第102页。

③ [韩]金景善:《燕轶直指》卷5,[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2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70页。

④ 《清宣宗实录》卷45,道光二年十一月庚寅,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796页。

⑤ 嘉庆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步军统领禄康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600-026;多罗定郡王等:《金吾事例·章程一》“近仓米局全得挪移”“申禁城内米石不许出城城外米石不许出境”,第64—66页;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5-012。

⑥ 参见[清]松筠(穆齐贤)记,赵令志、关康译编《闲窗录梦译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167、164、180、204页。

⑦ 多罗定郡王等:《金吾事例·章程一》“申禁城内米石不许出城城外米石不许出境”,第64—65页。

⑧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步军统领吉纶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8-040。

⑨ 该碑在北京西城区华嘉胡同,碑文参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清)》第80册,第47页。

⑩ 嘉庆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号05-0540-084。据民国地图所示,“大沟巷,内三区,东四。南通猪市大街,北通隆福寺街。”感谢齐大之提供资料。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四年通州粮仓吏胥舞弊案》,《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

⑫ 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步军统领英和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77-075。

⑬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步军统领吉纶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8-040。

⑭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5-012。

⑮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步军统领吉纶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8-040。

⑯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5-012。

⑰ 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七日给事中蔡廌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3783-034。

园地方一所房屋院内即开设有8家米店。<sup>①</sup>珠市口有复兴粮店。<sup>②</sup>据后来日本学者仁井田陞调查,山西临汾、襄阳两地经营粮食的商人多开设粮铺生理。<sup>③</sup>还有设在彰仪门大街路北的万丰粮店。<sup>④</sup>笔者估计,这时的零售商铺数量至少延续了乾隆时的水平,或比乾隆时更多。

此外,在各城门内外附近地区,也出现了零售兼批发的市场。

1. 东直门。有官员看见“东直门出米甚多,均由各粮店发给,陆续运至长营村地方,再递运至通州城大斗铺,以便上船交纳”。<sup>⑤</sup>

2. 朝阳门外。据步军统领衙门官员调查,朝阳门外北河沿起至东便门外一带地方有米局97家。<sup>⑥</sup>太平、储济、裕丰、大万安、小万安5座粮仓附近,“向来开设米局甚多”。其中,左营地方开有米局29座,北营地方开有米局37座。<sup>⑦</sup>这里形成的粮食零售兼批发市场,是在乾隆时已经存在商铺、米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商人从朝阳门外粮铺用小车载八石,推赴通州售卖,<sup>⑧</sup>也有商贩在城内购米,“每次装米数斗,扛运出城,寄存隙处,成总雇驴驮载”,运往良乡、房山等处村庄。<sup>⑨</sup>御史邱家炜在朝阳门外新桥地方,“目睹负米出城者,自朝至暮,肩摩踵接,络绎不绝。”<sup>⑩</sup>御史德勒克呢玛奏称,“近来每日负米出城者竟至百石之多。且有在朝阳门外串成整袋,用骡马驮载,绕道东去情事”,而“朝阳门外百胜庄六里村一带,为运往杨村、蔡村、河西务、天津等处必由之路”。<sup>⑪</sup>

3. 广渠门、东便门。嘉庆年间,官兵在广渠门外抓获马大等拉运小米出京车辆。据马大称,其在马驹桥开设杂粮铺吉成号生理,向在各城外米店购买小米回铺给附近农民食用,不止1次。<sup>⑫</sup>东便门外、广渠门外,有商贩高通等人,“米车三车,共三十七石一斗二升零”,从“东便门外椿树园米局拉运,同往马驹桥吉成号”。<sup>⑬</sup>另有商贩从广渠门内外和东便门内外的粮铺购买米粮,由铺户雇用人夫、妇女等人,背运出城,运往天津、武清县河西务等处粮店,零星发售。<sup>⑭</sup>

4. 广宁门。有山西商人在广宁门内外开设粮铺,“陆续收买米石,以备零星转卖”。据查广宁门内外各铺户及城内各米局“存各色米有四五百石至千余石不等”。<sup>⑮</sup>后来,官兵抓获从广宁门内外向良乡贩运粮米的良乡铺户张之春和车夫王二,“起获米三车,计老米、稔米各二十石,小米十三石”。<sup>⑯</sup>也有官员看见,“大车十余辆,运米出广宁门,并见大街各米铺门口,车辆络绎装载”。<sup>⑰</sup>

① 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麟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2-028。

② 道光二年闰三月巡视南城察院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序号128550-001。本文有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的获得,得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邱仲麟研究员、博士生颜瑞均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海英的帮助复制,特此表示感谢!

③ 仁井田陞辑『北京工商ギルド资料集(二)』『东洋文献センター丛刊』第25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75-1976年,157-161,200-202页。

④ 杨静亭编:《都门纪略》,张智主编:《中国风土志丛刊》第14册,第45页。

⑤ 《清宣宗实录》卷27,道光十五年八月乙卯,第157页。

⑥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5-012。

⑦ 多罗定郡王等:《金吾事例·章程一》“近仓米局全得挪移”,第62页。

⑧ 嘉庆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5-012。

⑨ 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步军统领宜兴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630-019。

⑩ 道光二年闰三月二十九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邱家炜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632-044。

⑪ 《清宣宗实录》卷321,道光十九年四月己巳,第1024-1025页。

⑫ 嘉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麟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42-028。

⑬ 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巡视南城礼科给事中明舒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2-066。

⑭ 嘉庆十八年五月初十日步军统领吉纶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8-040;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十三日步军统领英和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1849-002。

⑮ 嘉庆六年无名人士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431-056;嘉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步军统领明安等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序号159166-001。

⑯ 嘉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步军统领明安等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序号159166-001。

⑰ 《清仁宗实录》卷332,嘉庆二十二年七月辛未,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第390页。

5. 左安门。左安门内有陞元粮店,向天津“武清县贩卖”。<sup>①</sup> 广安门外桥边开城门后,官兵“即见有驴驮米石,络绎出城”,他们是从从广安门内云生号、云聚隆号粮店贩出粮食。其中,云生号粮店“积米大小二十二囤”,云聚隆号粮店“积米大小二十囤”。<sup>②</sup>

6. 永定门。在永定门内、左安门内也有向外贩米事件。<sup>③</sup> 官兵在永定门外抓获从正阳门外珠市口复兴粮店购粮的商人,准备运往杨村万全堂糕点铺。<sup>④</sup>

7. 右安门。有人从右安门内义成粮店“运米出城”,有米六七百石,贩往洪门、黄村、庞各庄、固安县等处。<sup>⑤</sup>

8. 西直门。有官员报称,前往西直门外八里庄地方,“见有骆驼一只,骡驴十余头,驮载布袋,自东而西”,于是“拦住查看,除黑豆、麦面外,其余均系糙稷米共计十二石有零。当向运米人问四等究出,系西直门内万和、永裕、广兴隆、丰隆、永和等铺发卖之米”。<sup>⑥</sup> 一般来说,安定门、德胜门附近向外贩卖的商贩很少,因为这里距离运河较远,贩运不便。但其他各城门外运达运河道便利,“或由芦〔卢〕沟桥至雄县;或由张家湾至天津;或由马驹桥至武清;或由东坝至三间房”,距京城三四十里,或二三百里,都是商人“运米上船之处”。<sup>⑦</sup> 以上各城门外内外之所以形成零售兼批发市场,向天津、直隶等地销售粮食,是政府禁止外城粮食外贩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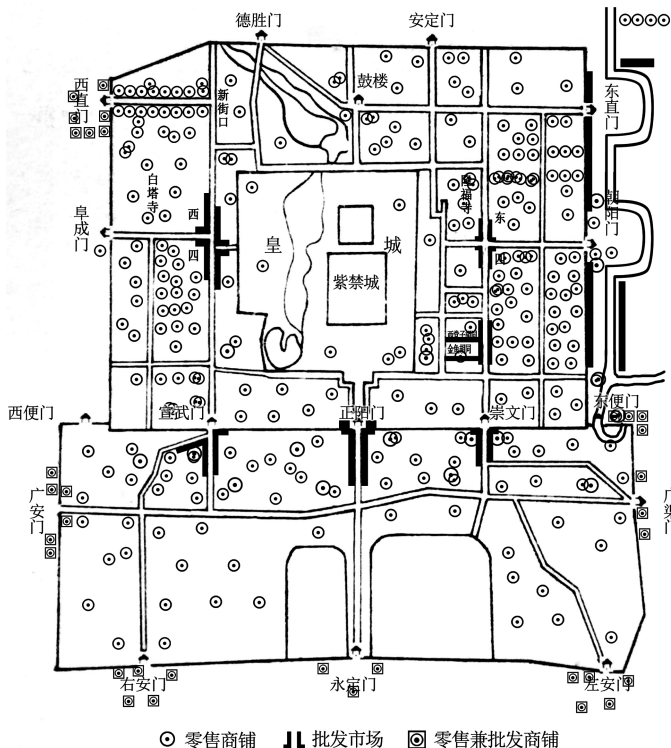


图3 嘉道时期粮食市场分布示意图

- ① 嘉庆十九年三月二十日步军统领英和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230-011。  
 ② 道光四年三月十一日巡视西城御史祥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665-018。  
 ③ 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巡视东城给事中龄椿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218-035。  
 ④ 道光二年闰三月巡视南城察院奏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序号128550-001。  
 ⑤ 嘉庆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巡视西城礼科给事中庆明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2143-022。  
 ⑥ 道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巡视西城御史琦琛等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4043-068。  
 ⑦ 嘉庆二十年七月初八日掌广东道监察御史孙世昌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号03-0214-045。

图3为嘉道时期市场分布示意图,从中可见,嘉道时期的内城除了原有的东四、西四牌楼批发市场之外,东四牌楼南边的西堂子胡同、金鱼胡同一带是米局集中地,形成了米粮零售兼批发市场。外城除了原有正阳门外、宣武门外的批发市场之外,崇文门外也形成了批发市场。朝阳门外到东便门外一带则形成了以米铺、米局发展起来的零售兼批发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零售兼批发的商铺已经遍布除德胜门、安定门、西便门之外的各城门内外及附近地区。总体来看,内外城的零售市场除商铺数量增多之外,仍然保持与乾隆时大致相当的状态。

将以上3个不同时期的批发、零售、批发兼零售市场综合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前期京师城内外粮食市场的布局。内城批发市场,康熙时在东四、西四牌楼,嘉庆时发展到东四牌楼南面的西堂子胡同、金鱼胡同一带。外城除了康熙时已经形成的正阳门外粮食街批发市场之外,不断扩大至宣武门外、崇文门外。再从深一层次看,正阳门外和东直门外的市场,当为一级批发市场。正阳门外批发市场经营的粮食品种比较其全,稍晚时候形成的东直门外批发市场,则以收购和出售大量棒、甲米为主。这两个一级批发市场的粮食都来自通州粮食集散地,通州“东关有永茂、永成、福聚、涌源四大碓房,每石无论停贮久暂,得价一分,租给商人堆贮,陆续卖给京城,及通州本地铺户”,或由“客商招揽,在京铺户承买”。<sup>①</sup>乾隆时,韩国使臣“巡正阳门南城底,出正阳门甕城”,再“渡大石桥,似城之濠水,水势之广大,可泛小舟,似通通州江水”,<sup>②</sup>说明通州到正阳门也可通水路,麦子沿此路可达正阳门外大铺户。两个批发市场的大商户决定了全城每月的市场粮价,即“外城粮市,有正阳门、东直门外二处,铺户人等,每月于附近庙中,会议一次”,汇集各处粮价,商量酌定市场上整个粮食行情与价格。<sup>③</sup>同时,一级市场也向内外城二级批发市场输送各类粮食,如正阳门外市场主要向内城西四、东四,及宣武门外、崇文门外二级批发市场转贩粮食,东直门外的市场则主要向内城西堂子和金鱼胡同一带的二级批发市场输送稻米。朝阳门外到东便门外一线米局密布,其米粮来源主要是八旗官兵出售配给的粮食。据以上描述可绘制清前期京城批发市场示意图,详见图4。

按照批发市场覆盖附近地区零售商铺的原则,内城西四批发市场主要为西城零售商铺输送粮食,东四批发市场主要为东城零售商铺转贩各类粮食。嘉道之后形成的西堂子和金鱼胡同形成以稻米为主的批发市场,辐射范围也应该是向东城各地米铺输出稻米。然而实际上在内城的粮食交易中,并非所有零售商铺都遵循这种规律。例如:从西直门内至新街口一路,有零售铺户32家,在西直门外有米铺20家,这些零售商铺虽然在西城,但有的商铺则是从东四市场购买粮食,并称“系买自东、西两市各米局,零星售卖柴卖”。<sup>④</sup>东、西两市,指东四和西四牌楼2个批发市场。嘉庆时,“京员或自行到仓支领,或交米票,向铺户折换细米”。<sup>⑤</sup>道光时人穆齐贤记录了自己向米局购买米粮的情形,并提到有旗人到米局出卖米票,兑换钱文、钱票等事情。这些米局有的在西城,有的在东城朝阳门附近,<sup>⑥</sup>这说明在旗人生活中用米票直接兑换钱文应该是常态,米局商人持米票直接到仓领米,不用到二级市场批发稻米,所以在内城的米粮交易中,并不是严格按照市场层级来区分的。在外城,零售铺户则分别从正阳门外、宣武门外、崇文门外批发市场进货。

零售市场在内外城分布极其广泛,康雍时期以碓房、碾房、米铺为代表的粮食零售网点还不是很多,到乾隆时已经遍布全城。到嘉道时,在东便门、广渠门、广宁门、朝阳门、正阳门、西直门外,内城西安门、阜成门内、西直门内、隆福寺及附近地区商铺数量明显增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康雍时期分

① 《查办碓房堆贮客麦疏》,乾隆《通州志》卷10《艺文·疏议》。

② [韩]洪昌汉:《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39册,第135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843,乾隆三十四年九月,第267页。

④ 多罗定郡王等:《金吾事例·章程一》“申禁城内米石不许出城城外米石不许出境”,第64页。

⑤ [清]祁韵士编:《己庚编》卷下“议奏仓场两议俸米折”,《丛书集成续编》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影印本,第598页。

⑥ 松筠(穆齐贤)记,赵令志、关康译编:《闲窗录梦译编》,第64、187、23、97、142、14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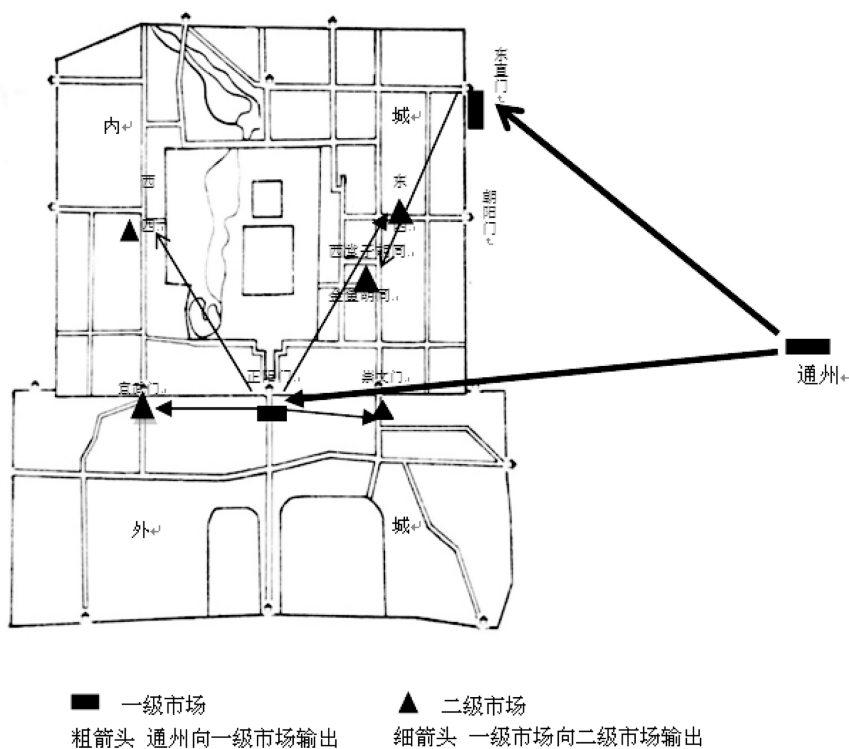


图4 批发市场示意图

布在朝阳门外附近粮仓地区的零售商铺,到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经变成米局密布的零售兼批发市场。其他各城门外都有这类商铺,主要通过零星购买城内外的粮食,成批向京城以外地区发卖。这是受到政府规定内城粮米不许向外城贩卖、外城粮食不许向境外贩运的政策影响,形成各城门外商铺零售兼批发的市场,具有向天津、直隶等地区扩散趋势和辐射作用,为京城周围的市场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 四、结论

粮食是清代前期京城流通的主要商品,也是流通数量最大的商品。据笔者估算,乾隆时,北京城市市场中的棒、甲米、小麦、小米入市量约为 245 万石。<sup>①</sup> 因此,由粮食交易形成的市场分布,在当时的京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清代前期的京城政府与市场共同起作用,商品粮食批发市场不是根据中地论形成六边形的分布。在内城,由于皇城的存在,造成西部与东部的交通往来不方便,从而形成西、东两个二级批发市场,且贯穿整个清代。外城地面是东西长和南北短的长方形,南北分布的零售商铺距离各批发市场不远,而围绕前三门的一、二级市场与城墙平行存在,东西分布的商铺到各批发市场的距离则比较适中。零售市场广泛分布于内外城各居民胡同中,是以居民购买便捷为基础而形成的。

应该说,就粮食市场来说,正阳门外一级市场可能与城市中心地理论有些关系,但东直门外一级市场则与城市中心地理论没有关系。由此是否可以推论,从清代前期北京的居民居住情况看,与百姓生活关系越大的商品市场,越分布在百姓住处附近,而且还有送货上门的情况,如蔬菜、粮食和一些小食品,都有部分是沿街叫卖、送到家门口,人们不用去市场购买。比较高档消费品,平时百姓使

<sup>①</sup> 参见拙著《清代前期政府与北京粮食市场研究》“市场运行特点分析”,待出版。

用少的商品,如珠宝首饰等,可能只聚集在正阳门附近的中心地理市场。当然,清代前期京城更为完整的市场布局,还待进一步根据其他具体商品市场的研究来加以总汇,并从理论上进行再探讨。

##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in Market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eng Yibi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ijing was not a completely free market, which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so the market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Central place theory (proposed by W. Christaller) based on the free market economy did not conform to the reality. At that tim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mmodity grain was representative. This paper will give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rket distribution of commodity grai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market layout of the capital after studying other commodity markets and analyzing the layout of the whole market of the capital.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Beijing; Distribution of the Grain Market

(责任编辑:丰若非)

### 《困境下的多重博弈： 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出版

吸烟是亿万烟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卷烟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更是国家和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上海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和企业的中心。1945—1949年的中国虽然只有短短四年,却是一个承先启后、去旧迎新的时代,这一时期以往关注较为有限,实却相当关键,是解析中国长时段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之一,理应受到重视,加以细致研究。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无论近代企业史还是战后社会经济史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魏晓锴所著《困境下的多重博弈: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研究(1945—1949)》,为首部研究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专著,既避开以往政府史与企业史研究以政策抑或制度为重点的研究路径,又突破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维度,从政府、社团、工人互动的角度探讨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发展演变,审视特殊背景下围绕上海卷烟企业生存发展的各类博弈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全书围绕卷烟税收、原料供应与工人年赏进行专题考察,相应展示围绕着卷烟业而展开的政企博弈、合作与互动。并通过中华烟草公司承购权纠纷案,透视战后“国营”企业“民营化”的艰难历程及其背后利益纠葛。本书资料扎实,内容丰富,视角独到,叙述详尽,真实再现了战后上海卷烟业政企关系的历史样貌。全书35.8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发行。